

论葛浩文翻译本质之论^①

——兼谈译学界“翻译本质”之争及其启示

周领顺

(扬州大学,扬州,225127)

摘要:本文针对葛浩文有关翻译本质的论述进行了解读。葛浩文翻译本质之论,实际是他对于复杂翻译活动中遇到的一些问题及其应对策略的感悟。为了透彻理解翻译的本质,本文提出进行“翻译内”和“翻译外”、原型“翻译”和“翻译活动”区别性研究的新路径,对于目前有关翻译重新定位的讨论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关键词:翻译本质,葛浩文,原型,翻译活动

[中图分类号] H31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8921-(2016)05-0076-05

[doi 编码] 10.3969/j.issn.1674-8921.2016.05.010

1. 楔子

美国汉学家、“首席”翻译家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因译莫言而名声大噪,其于中国文化“走出去”,功莫大焉。葛浩文通过自己的实践,阐发了他的相关翻译思想,而对于翻译本质或性质的论述,就是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

翻译家葛浩文是实践家,他借自己的实践对于翻译本质所作的论述与理论家从理论角度所作的论述并无根本的不同。但葛浩文所论翻译本质的东西,实际是他在翻译实践中遇到的一些具体问题,以及他在应对这些问题时所生发的种种感悟和基于此采取的应对策略。归根结底,这些问题源于翻译实践,并终究归于翻译技巧讨论的范畴。而且,葛浩文的论述时有相互抵牾之处。那么,该怎样给葛浩文矛盾的论述以合理的解释?又该怎样认识翻译本质的东西呢?

对于翻译的本质,译学界早已有过很多的论述,迄今尚无定论。目前,恰逢译学界正在进行新一轮有关“翻译”定义和认识的大讨论,因此对葛浩文有关翻译本质之论的再论述,将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和启示作用。

葛浩文的翻译本质观散见于网络、书籍、报刊、谈话、访谈之中,时间跨度大,概括起来主要有:翻译是“重写”或“改写”;翻译是“背叛”也是“救赎”;翻译是“补充”也是“折中”等几点。为了研究的深入和清晰,本文将基于翻译家葛浩文的有关论述,提出进行“翻译内”和“翻译外”以及“翻译”(原型)和“翻译活

动”(社会活动)区别性研究的新路径。

2. 翻译是“重写”或“改写”——主观与客观

葛浩文(2014:28)说:“重写显然是翻译的本质。”“大多数作家至少应该宽容那些被赋予了将他们的作品用其他语言重写任务的男男女女们,因为翻译的性质就是重写。”(魏旭良 2014)“根据我个人的经验,大多数的作家都能容忍自己的作品在翻译时被改写——因为显然改写是翻译的本质。”(李雅博 2010)

重写或改写更多的时候是基于一般人所能理解的语言、文化差异等客观原因而发生的,对于富于创造性的文学翻译来说尤其如此。重写或改写就是一定程度上的创作,或者说是“二度创作”。葛浩文说:“译者需要同时做三项不同的工作:阅读、阐释(或批评)与创作。”(孟祥春 2014)客观上讲,“一部作品一旦进入另一种语言,就一定会有所改变”(葛浩文 2014:31)。所以,葛浩文认为,“理想的翻译在理论上是存在的,但在实践中又无定论。”(葛浩文 2014:39)或者理想的翻译如葛浩文认可的美国学者弗伦兹(Horst Frenz)所言的“运用现代语汇与词序的当代作品,出之以我们这个时代的表现法,看上去不应当像是翻译”(葛浩文 1980:106)。这一态度实际是对于现实中翻译“理想”的虚无、对于现实翻译的无奈和对于翻译活动复杂性的充分认识而生发的感慨,如同理论上“有千足金”而在现实中又难以寻觅一样。葛浩文认可的理想翻译,和钱锺书所期盼的“化境”或傅雷崇尚的“神似”异曲同工,不管在现实中能不能实现,但作为追求的目标,却也无可厚非。

翻译毕竟是翻译,无原文可依的“翻译”当然不是翻译,所以奈达(Nida 1993)才有了在翻译活动涉及的诸多要素中只有原文才是客观存在之论,这也

作者简介:见主持人语。

* 本文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汉语‘乡土语言’英译实践批评研究”(编号 15AYY003)、江苏省社科基金项目“苏籍翻译家翻译行为共性研究”(编号 14YYB002)和扬州大学“高端人才支持计划”的部分成果。

是洪堡特(Wilhelm von Humboldt)在1816年述说的“真正的精神只存在于原作中”(Lefevre 1977: 45)的意思。有原文可依,既让译者有规可循,但又限制了译者的行为。也就是说,译者的自由是有限的,译学界常说的“带着镣铐跳舞”就形象地说明了这一点,所以也就有了当年鲁迅原本认为翻译要比创作容易而事实证明并非如此之悟。翻译即重写或改写之说,表明译者拥有的权力只是部分意义上的,是相对的。而且,葛浩文也认可“有人说翻译家是失意的作家”^②之论。虽然葛浩文承认在翻译的实践过程中可以证明翻译是重写或改写之实,但一听到人们将他的翻译称为 creative translation(创造性翻译),仍不免觉得“刺耳”^③。在中国译学界,“创造性翻译”是褒奖之语,但“创造”虽然是褒义词,可也意味着“无中生有”,意味着译文对原文的偏离,有突破翻译“忠实”伦理底线之嫌。对于译者,褒贬共存,所以葛浩文有这样的感觉也就不难理解了。事实上,他的翻译并不乏创造的痕迹,这倒有些“做得说不得”的雅趣。

概括地讲,重写或改写的发生主要有这样几个原因:(1)因为读者对象不同,为适应不同的读者所以需要重写或改写。葛浩文说:“作者是为中国人写作,而我是为外国人翻译。翻译是个重新写作的过程。”(单春艳、孙筱岚 2014)(2)因为翻译要面对很多不确定的因素,所以需要重写或改写。葛浩文说:“翻译是一个重新写作的过程,我热爱这个事业的挑战性、模棱两可性和不确定性。我热爱创造性和忠实于原著之间的冲突,以及最终难免的妥协。”(刘爱兰 2015)(3)因为译者要再现作者创造的陌生内容和风格,所以需要重写或改写。葛浩文(2014: 38)说:“严格来说,译者的任务要比作者更棘手,因为他不仅要‘写作’那些域外的陌生的东西(与作家不同,作家专门写他最熟悉的),他还要以不同的风格写作。”“作者总是在写他熟悉的东西,而译者不同,他写的是他不怎么熟悉的东西,要读它、理解它,然后再创造性地改写。”^④(4)要满足目标语读者的一些需求,所以需要重写或改写。葛浩文说:“大多数的中国作家写的故事都不够完美,因此译者必须承担起编辑的责任去把译文变得更加有可读性。”^⑤在充当编辑的过程中,重写或改写成为核心的内容。

3. 翻译是“背叛”也是“救赎”

——翻译内与翻译外

葛浩文说:“翻译即背叛。”(段雷宇 2013)他甚至认为:“所有的翻译都是一种背叛。”(李雅博 2010)矛盾的是,他也说过“翻译不是背叛,而是救赎(salvation)”(孟祥春 2014)的话。

声称翻译即背叛,是基于翻译不可能实现完全对等的客观事实而得来的。把翻译称为“背叛”(“背

离,叛变”之义),与把翻译称为“重写”或“改写”,面对的事实相同或相似,只是表达的语气有所差异罢了,尽管在词汇意义上,“重写”或“改写”是在原有基础上进行的,而“背叛”完全走向了反面。当然,程度有高有低,比如葛浩文说的“阅读(英译的)莫言就是在阅读我”(叶子 2013)和“翻译的小说里所用的语言——优美的也好,粗俗的也好——是译者使用的语言,不是原著作者的语言”(周晓梅 2015),就该是达到了他所说的“背叛”的程度了,这是因为主体发生了改变,即“原著作者的语言”变成了“译者使用的语言”。当然,这是夸张的说法,若此,便算不得翻译;如果译者完全成了作者,“译者使用的语言,不是原著作者的语言”,则超出了翻译的范畴,甚至沦为了无原文可依的“伪译”。

但葛浩文“翻译不是背叛,而是救赎”又是怎样来的呢?这是从民族文学与文化传播的角度出发的。为了认清这一点,我们需要从“翻译内”和“翻译外”(周领顺 2014: 7-15)两个层次上看问题。

所谓“翻译内”,涉及语言文字的转换和意义的再现等翻译本身的因素,包括微观上的风格、语气、情态、词彩、词性、标点、句法结构、语篇、词汇及其联想意义、韵律和意象等从内容到形式的再现,以及策略和方法、翻译标准、翻译单位和意群的具体运用等等。而翻译外部的因素,则是一些关于翻译活动但又超出翻译本身的因素,比如宏观上有关翻译史、翻译性质、翻译标准、翻译单位和意群的划分、文本选择、个人译风、接受人群和环境、翻译效果、历史和时代、审美以及个人和团体目标等因素。换句话说,“翻译内”指的是翻译实践本身的事,或者说针对的是翻译实践;“翻译外”指的是一切关涉翻译活动的事,既关涉翻译的外部条件,也关涉评价的角度。

从翻译内讲,有些是不可译的,但从翻译外讲,我们从来没有停止过翻译的努力,所以才使民族之间的交际得以维系。因此,翻译又是“救赎”,如果民族间没有翻译的存在,世界的历史便少了很多精彩,所以葛浩文说:“(在翻译过程中)有没有(信息)丢失呢?丢失自然是有的。但这又怎么样?因此就不译了吗?理想的翻译在理论上是存在的,但在实践中又无定论,大概正是这徒劳的寻找,才使翻译从‘技巧’变成‘艺术’。语言不同,其局限性和可能性也有所不同,因此,老老实实的翻译能以作者无法想象的方式提高原作的水平。”(葛浩文 2014: 39)

在翻译内,翻译行为一定程度上能反映原文真的一面。比如,从翻译内讲不可译的(如 R. Frost 说的 Poetry is what gets lost in translation),而在翻译外作为一项社会活动却又是可为的(如 M. Dorent 说的 The literature of the world has exerted its power by being translated)。从翻译外着眼,翻译行

为功莫大焉,比如葛浩文所说的,“译者是人类精神的信使。翻译是不同文化的融合,是创造性的价值生成。虽然翻译中对原著而言会失去一些东西,但这不是译者的错,翻译是必需的。”^⑥他说:“尽管翻译不是一种走近带有异域文化背景作品的十全十美的方式,但它确实是一种方式,而且几乎总是一种能够让作者获得国际声誉的方式。”^⑦他还举例阐述了这一点。

在世界历史上文学翻译家不同凡响的影响力有例为证:英国翻译家亚瑟·韦烈(Arthur Waley)成功英译日本作家紫式部的《源氏物语》,使得这部作品赢得了广泛的世界声誉,韦烈的弟子霍克思(David Hawkes)、中国翻译家杨宪益、戴乃迭夫妇的《红楼梦》全译本也将中国的经典文学引入了世界文坛。(何琳 2011)

按照葛浩文的话说,译者“不论别人认为他的工作是一种技巧也好,或者是一种艺术也好——或两者兼而有之;他是一位传播人,一位解释人,在国际了解的链条上,他是主要的一环”(葛浩文 2014: 15),但因纠结于翻译内不可译的因素,所以他又充满了愧疚:“当你在翻译一篇文章时你是在把这门语言变成自己的语言。虽然这不是掠夺,但当我这么做的时候,我对它做了一些不好的事。但这又是我能够将其呈现给其他人的唯一方式。译者总是在道歉。我们用一生的时间赔不是。”^⑧

4. 翻译是“补充”也是“折中”

——从文本到可见性译者

葛浩文(2014:30)说:“翻译只能是对原作的补充,而非复制。”他(2014:46)又说:“翻译是原作的补充,不是取代,对此他们也能理解。翻译能延长原作的生命,能揭示原文隐藏的信息。”

翻译不是复制,也不可能替代原文。但是,既然不能复制和替代,为什么葛浩文还说“中英文并不存在完全类似的说法,或者说他们的意思完全相异,我的目标就是要复制出原文的语气”(金艳 2014)呢?

翻译时,客观上的原因和困难虽然很多,但译者的主观努力是不能放松的。这里所说的要“复制出原文的语气”,只是他努力的目标;这里的“复制”是通过创造性劳动而努力再现的问题,甚至和“创造”无异。译文不可能毕肖原文,反映了翻译活动过程中的客观局限以及译者的主观故意,因此作者对译者也就多了一份理解。所以,他在谈到作者的配合时说:“他(莫言)会很体贴、和善地给我解释作品中一些晦涩的文化和历史背景,他明白翻译是对原文的补充而非替代。”^⑨

翻译是补充甚至是任何改动后的折中。或者说,是译者根据翻译活动中出现的一切情况而调适

的结果。译者毕竟是翻译活动的操纵者,甚至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的角色。所以,葛浩文说:“翻译家看走了眼、翻译家有意为之、原作语言暧昧而翻译家缺乏想象力以及译文的矫揉造作。而翻译的本质是一种折中。”(何琳 2011)“折中”就是妥协,就是译者的无奈之为。

“翻译永远意味着‘未完成’”^⑩,有遗憾,就有了葛浩文说的“译本中唯一可见的(visible)就是译者”(孟祥春 2014)的评论。葛浩文解释道:“现在用的就是拼音。这个词用声音念出来,才更有意义,很难找到合适的英文,也不能直译。”^⑪因客观上“很难找到合适的英文”,那就不得不去努力创造以传意了。在翻译遗憾中,成就了译者创造者的地位。葛浩文说:“有人说,他就是个中间人物嘛,他就是桥梁。我觉得一个翻译也是一个创造者,是有创作的责任和本分的。虽然也要听原作者的,要把原作忠实地表现出来,不能把它加得变样子,也不能减得变样子。有人曾经问翻译中的改动的问题。翻译都是要改动的。这就要看改动的方式。我懂中文,我又能用英文,可是中文跟英文之间是存在创造性的,这是我们要抓住的,也是最难抓住的。我们歪曲原文,那是不对的;在表达英文的时候超过原文,也是不对的。现在我们常说的翻译标准‘信、达、雅’,我倒认为‘雅’比‘信’和‘达’重要。”(闫怡恂 2014)

他还满腹怨言地说:“我觉得,大多数没有做过翻译的人并不重视译者的作用,认为译者就应该是无形的,凡是译著中美的地方要归功于作者本人,而不好的地方则要找译者算账。但是,事实有时并非如此。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文学领域有一位著名的翻译家格雷戈里·拉博萨,曾得到加西亚·马尔克斯本人的赞赏。据说,马尔克斯认为《百年孤独》的英文版本比他的原著还要好。也不知道这一启示会不会让译者感到高兴。”^⑫

创造的往往是超越“翻译”(more than just translation^⑬)之处。遗憾、偏离中饱含着创造,这也是埃斯卡皮(Robert Escarpit)所谓的“创造性叛逆”(creative treason)的真意所在吧。

5. 译学界“翻译本质”之争和研究的新路径

译学界对于翻译本质或性质的论述汗牛充栋,却和实践家的感受并没有本质的不同。理论家不是实践家,却扮演着实践家代言人的角色。理论家对于翻译本质的描述不仅在葛浩文的叙述中全能找到,而葛浩文作为真正的翻译实践家,感受也更多、更全面。他的一些貌似矛盾的言论,是翻译活动复杂性在其认识上的集中投射。翻译实践家葛浩文是“翻译活动”的体验者。为了认清翻译本质的东西,有必要区分作为名物的原型“翻译”和作为活动的翻

译——“翻译活动”之间的异同。

“翻译”是被叫作“翻译”的原型。原型不需要读者的参与,也不受意志和环境的影响,原文永远是唯一客观的存在,译文和原文之间永远是“如影随形”的关系。原型是本,本不会随环境的变化而变化,这倒有点像“语义学”和“语用学”的关系,也有点像索绪尔“语言”和“言语”的关系。原型终究是原型,最经典的,也是最原型的,是最本质的。哲学界认为,“本质”这一概念是亚里士多德第一个明确使用的,他认为“事物的本质就是它的第一本体”(杨晓荣 2008)。比如,“猫捉老鼠”是原型,至于新的时代出现了新的现象(如捉老鼠不用猫了、有的猫不捉老鼠了、有的老鼠捉猫了等现象),都不会影响原型的纯洁性和唯一性。即使一个词有多个义项,也会有一个是原型义项。比如,“跑”的原型义项是“两只脚或四条腿迅速前进”,而另外的“物体离开了应该在的位置”和“液体因挥发而损耗”等则属于衍生的义项(《现代汉语词典》),更不用说更多的和不断更新的比喻用法了。而“翻译活动”是包括交际过程、翻译过程和翻译环境等一切因素在内的社会活动,充满了复杂性。葛浩文围绕翻译性质所展开的讨论,全是翻译活动中遇到的问题,既有客观的,也有主观的,而主观的,又主要来自译者的意志性。

在翻译上,当一般说翻译不仅仅是语言文字符号的转换而应该是文化的交流、移植云云,就等于把翻译看作一项活动,在本质上应反映翻译在交际环境、动态环境中的语用意义,这是“翻译活动”的本质特征。但作为名物的“翻译”是翻译符号本身所固有的、独立存在的符号意义。符号意义也是一种意义形态。比如,认为甲文字中的 A 等于乙文字中的 B 并进行转换时,翻译的符号意义便发生了。或者如英语中的 ABCD 等于汉语中的“甲乙丙丁”,转换后可用于目标语言之中,这样翻译的符号意义也就发生了。这是翻译的自体。本体上的翻译既不需要读者参与,也不受过程和环境因素的干扰,而如孙致礼(2003:6)把“翻译”定义为“翻译是把一种语言表达的意义用另一种语言表达出来,以达到沟通思想情感、传播文化知识、促进社会文明,特别是推动译语文化兴旺昌盛的目的”,述说的实际是“翻译活动”的特征,他人人为地给“翻译”增加了感性化的色彩。许钧(2007:50)说的“翻译的社会价值,是由翻译活动的社会性所决定的”,就是把翻译作为社会活动看待的“翻译活动”。从“翻译”原型上讲,葛浩文(2014:30)所说的“翻译只能是对原作的补充,而非复制”的话,反映的是“翻译活动”中的实际情况,而按照原型而言,“翻译”恰恰是“复制”。以往译学界讨论的“翻译”本质实际是“翻译活动”的本质,也即“对翻译本质的认识,集中起来有两点:一是关于翻译是一种怎

样的活动,一是关于翻译是一种什么性质的活动;前一点讨论翻译的定义,后一点涉及翻译的概念和分类”(王克非 1997)。

葛浩文在翻译活动中对于翻译本质的认识,归根结底源于翻译活动的复杂性,其中也包括矛盾体译者的复杂性。讨论“翻译活动”,不可能忽略译者意志性的存在。比如,有意志,就会有创造。葛浩文承认:“前一阵子,有人问我,翻译莫言的最新小说时是否还是会跟以前一样那么 Creative,意思是‘有创造性’。我开玩笑说,既然莫言得了诺奖,我的翻译要更接近原文。”^⑭他变相证明了人们将他的翻译称为 creative translation 的客观存在。

翻译活动展现为一个过程,正如交际过程一样,“噪音”是客观存在的,所以偏离原文总是难免的。正如葛浩文所述,“英文和中文可以说是天壤之别的两种语言,真要逐字翻译,不但让人读不下去,而且更会对不起原著和作者。可是,不管我怎么讲,批评我翻译的人常指责我没有逐字翻译。”^⑮人们(也包括译者)期待译文朝原型靠拢是正常的心理状态,但把本应该有噪音的“翻译活动”纯净化,无疑简单化、理想化了。

作为名物的“翻译”有两个基本条件,一个是语码转换,一个是意义再现。除此之外,便是作为“翻译活动”的其他因素了,比如目标、效果、历史、环境、过程、审美、人(译者、受众等)、翻译形式等因素。有关重新定义和定位的呼声,正是基于“翻译”核心外围的、主要来自“翻译活动”的翻译形式变化的考虑。可以看出,作为名物的原型“翻译”和作为活动的翻译——“翻译活动”之间是有区别的。不变的是原型,变化的是外围。

具体而言,原型“翻译”的定义不会随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变化的是作为“翻译活动”的翻译。翻译活动是社会活动的一部分,社会活动是人类活动的一部分,而人类的活动都是目的性的,所以追求方式的更新、内容的多元和效果的实用,自然是情有可原的。我们来看看屡遭攻讦的“翻译”定义:

《现代汉语词典》:一种语言文字的意义用另一种语言文字表达出来(也指方言与民族共同语、方言与方言、古代语与现代语之间一种用另一种表达;把代表语言文字的符号或数码用语言文字表达出来。

《辞海》:把一种语言文字的意义用另一种语言文字表达出来。

《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卷》:把已说出或写出的话的意思用另一种语言表达出来的活动。

《牛津英语词典》(a) The action or process of turning from one language into another; also, the product of this; a version in a different language. (b) to turn from one language into another; to

change into another language retaining the sense. . .

这样的定义或许不够全面,但一定是本能想到的“翻译”,也是最接近原型“翻译”的翻译定义。这些定义都不涉及读者等外围因素,也就不是社会活动意义上的“翻译活动”,这和攻讦者的立足点是不同的。

“翻译”定义要不要重新审视呢?要审视,也只能是“翻译活动”意义上的。译学界以前没有进行过这样的区分,统一定名为“翻译”,但我们心里应确保是后者。“翻译”需要重新定位吗?从活动的实用性(包括方式、内容、效果、目的等)角度,继续深化和细密化当然是可以的,所谓“重新”,更多表现为时代的特征,但因此否定原型意义上的“翻译”定义,似有些越俎代庖。翻译活动作为一项人类的社会活动,其方式、内容、效果和开展活动者的目的等,永远处于不断地被认识和更新之中,这也是由翻译活动的复杂性所预设了的。翻译活动是目的性活动,强调的是“译以致用”。但虽然强调“译以致用”,也必须有学理上翻译之本的规约。比如,如果笃信翻译之本是“改写”,你且给总理当回翻译试一试,能由着译者的性子而随意改动原文吗?

翻译的原型要求向原文靠拢,是本,而在此基础上纳入“活动”过程中的因素发生一些偏离,是情理之中的事,在向原文靠拢的过程中“走样”(钱锺书语)和完全面向市场接受靠拢时走样,表面相同,却是性质不同的两种做法。前者固本,是翻译之为翻译的根本,后者在“明知故犯”,有可能超越翻译的疆界。现实中的翻译出现“连译带改”是符合情理的,这是译者把翻译作为一项社会活动时受其目的因素控制的结果。就拿“信达雅”和严复的行为来说,“信”是固本行为,“达”和“雅”是目标行为,译者努力在追求单纯的原型“翻译”和追求实用性的“翻译活动”间平衡着,也说明现实中的翻译是平衡之学,译者具有语言性和社会性的双重属性,扮演着多面的角色。

最后,讨论翻译本质,本来就是一个富有争议的话题。我只是借研究葛浩文翻译思想的同时,结合目前译学界对翻译重新定位和定义的讨论,补充点滴看问题的角度罢了,偏颇多多,诚望读者批评指正。

附注

- ① 本文是作者于2015年秋在南京大学和天津外国语大学讲学稿子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讲座现场互动热烈,谨此向听众致谢!也感谢我的研究生们为查找资料所花费的劳动。感谢许钧教授、刘云虹教授和陈伟教授、许建忠教授、王洪涛教授点评。
- ② <http://men.sohu.com/20121219/n360785803.shtml>
- ③ <http://history.sina.com.cn/cul/zl/2014-07-07/113094803.shtml>
- ④ http://www.ilf.cn/News/111832_2.html
- ⑤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9fe0f010100qyv5.html

- ⑥ http://www.chinadaily.com.cn/hqgj/jryw/2013-12-10/content_10778739.html
- ⑦ <http://money.163.com/13/1016/10/9BA4JNE300253B0H.html>
- ⑧ <http://article.yeeyan.org/view/393394/355341>
- ⑨ http://www.chinadaily.com.cn/hqgj/jryw/2013-12-10/content_10778739.html
- ⑩ <http://www.infzm.com/content/1175>
- ⑪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17d4f5e01010dtq.html
- ⑫ http://culture.ifeng.com/wenxue/detail_2014_01/08/32824108_0.shtml
- ⑬ <http://creativetranslation.com/>
- ⑭ <http://history.sina.com.cn/cul/zl/2014-07-07/113094803.shtml>
- ⑮ <http://history.sina.com.cn/cul/zl/2014-04-23/105389105.shtml>

参考文献

- Lefevere, A. 1977. *Translating Literature: The German Tradition from Luther to Rosenzweig* [M]. Assen/Amsterdam: Van Gorcum.
- Nida, E. A. 1993. *Language, Culture and Translating* [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 单春艳、孙筱岚. 2014. 从生态翻译学视角看《生死疲劳》中宗教元素的英译[J]. 科技视界(29): 53.
- 段雷宇. 2013. 译者主体性对文学作品翻译的“操控”——以葛浩文译莫言作品为例[J]. 名作欣赏(33): 8-9, 13.
- 葛浩文. 2014. 葛浩文随笔[M]. 北京:现代出版社
- 何琳. 2011. 翻译家葛浩文与《中国文学》[J]. 时代文学(下半月)(2): 164-166.
- 金艳、张艳. 2014. 论葛浩文英译小说《酒国》的“陌生化”手法——以小说中“酒”的隐喻翻译为例[J].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8): 82-86.
- 李雅博. 2010. 西方视界中的中国近三十年文学[D]. 西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刘爱兰. 2015. 续说“镣铐”与“跳舞”——对“翻译研究三人谈”的延伸思考[J]. 上海翻译(1): 83-88.
- 孟祥春. 2014. 葛浩文论译者——基于葛浩文讲座与访谈的批评性阐释[J]. 中国翻译(3): 72-77.
- 孙致礼(编著). 2003. 新编英汉翻译教程[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 王克非. 1997. 关于翻译本质的认识[J]. 外语与外语教学(4): 47-50.
- 魏旭良. 2014. 改写者葛浩文——以《红高粱家族》英译本为例[J]. 常州工学院学报(社科版)(4): 61-64.
- 许钧. 2007. 生命之轻与翻译之重[M]. 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
- 闫怡恂. 2014. 文学翻译:过程与标准——葛浩文访谈录[J]. 国际文学视野(1): 193-203.
- 杨晓荣. 2008. 基于翻译本质观的翻译标准观:1978-2007[J]. 外语与外语教学(12): 37-41.
- 叶子. 2013. 猪头哪儿去了?——《纽约客》华语小说译介中的葛浩文[J]. 当代作家评论(5): 175-179.
- 周领顺. 2014. 译者行为批评:理论框架[M]. 北京:商务印书馆.
- 周晓梅. 2015. 试论中国文学译介的价值问题[J]. 小说评论(1): 78-85.

(责任编辑 管新潮)